

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

一部新的世界史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

——一部新的世界史

〔美〕L.S.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屠 笛 马晓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 石 久

责任校对: 徐培英

封面设计: 朱 虹

版式设计: 张汉林

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

YUANGU YILAI DE RENLEI SHENGMINGXIAN

[美]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 插页 229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004-1131-6 / K · 164 定价: 5.45 元

内 部 发 行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上起史前时代，下迄当今报刊头版所报道的重大问题，是对人类五万年历史的不可多得的高度概括。作者打破了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叙述历史的传统，选取了自古至今始终与人类命运生死攸关的四条“生命线”（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战争）展开分析，将人类经历的各种社会形态紧紧地串在一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及鲜明的当代特点，见解丰富而深刻，堪称一部以全球观点看人类的新的世界史，是作者继《全球通史》之后的又一警世力作。

一部新的世界史

——《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评析

马晓光

20多年前，美国历史学家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他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这是当时西方学者打破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传统，以全球观点看世界的代表性著作，从而确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西方史学界独树一帜的地位。最近，斯塔夫里阿诺斯又推出了他的新作《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以下简称《生命线》），这部著作既是作者对自己毕生研究成果的总结，又反映了作者在新形势下的思索，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积极探索和勇于创新精神。在此，我们尝试着对本书的有关方面谈一点儿自己的感受，以期对读者的阅读提供某些方便。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历史著作编纂中的西欧中心

127478

论或欧洲中心论开始受到强烈冲击。这种状况是与世界已进入全球一体化新阶段的背景相一致的。

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西欧国家纷纷从海外退回欧洲，欧洲的重要性开始下降，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意识受到沉重打击。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亚非拉美地区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上升。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知识模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上任何一地发生的事情，都能在瞬间传遍全球，不能不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人们在不断扩大眼界的同时，越来越感到地球正在变小。过去那种以自我民族为中心的意识，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怀疑阶段，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被人类的全球性观点所取代。全人类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从前西方殖民主义者那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已开始逐渐失去市场，因为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已经证明，损人不见得利己。人类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后，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一切都给予历史学家以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必须联系我们人类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前途去审视过去发生的一切，然后用过去的经验去说明现在的实验，为未来铺平道路。这种责任感使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发现：我们对历史作出总结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合时宜，西方文明史代表不了人类文明史，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也构成不了世界史，应开阔视野看待过去，用全新的全球眼光撰写包括全人类在内的统一的世界史。

当代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最早发动了对西欧中心论的猛烈批判。他毕其一生完成的 12 卷本的伟大著作《历史研

究》(1934—1961年),尽管其核心观点“文明形态说”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不同看法,但在倡导历史学家用全面眼光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方面,具有极大的解放作用。他的著作之所以风靡战后十多年,恰恰是符合了当时形势的需要,反映了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在战后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所忧所虑,即使在产生这部著作的形势已经消逝的今天,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仍是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加以仔细考虑的。

60年代以后,一批尝试从全球宏观角度考察世界史的著作相继问世,世界历史编纂进入了全球史的新阶段。如果说在50年代,历史学家在怀疑和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在其著作中明显地留下了欧洲中心论的痕迹的话,那么60年代以来的著作,不论在概念和认识能力的深化上,还是在反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全球观点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全球通史》,无疑在这些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此,我们可举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评价为代表。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说:“近年来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巴勒克拉夫对“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著作给予如此重视,正说明用全球观点写作的世界史更需有统观全书的眼光和统一的世界观,而这一时期由专家小组合作撰写的大部头世界史,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6卷本《人类史》、克拉克编的12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科恩和瓦尔贾维克编的10卷本《世界史》、曼恩编的10卷本《普罗皮兰

世界史》、克鲁泽编的 7 卷本《文明通史》、茹可夫编的 10 卷本《世界史》，尽管都是有价值之作，却在观点和结构上存在着缺乏统一的弱点。此外，这一时期的著作绝大多数依然承袭旧时的叙事式传统，采用的是把世界史的内容从民族国家的场所简单地搬到世界舞台去的做法。相比之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读过《全球通史》的读者自然会感觉到，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模式深受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影响，但其观点和使用的方 法已表明他代表了另一个时代。对此我们不拟评论。我们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位以全新的全球观点和深刻的分析能力看世界的独步当时的历史学者，在此后 20 年急剧变化的世界面前，在他目睹了全球性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结构性失业、日益严重的饥荒和核冬天威胁的情况下，他的所思所虑是什么？他如何将 自己的所思所虑写进了新著《生命线》中去的？

作者在本书 导言中的一句深刻发问或许最能反映出他对当前时代的忧心忡忡的感受：“为什么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的这一时代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并非想象的可能性的时代？”的确，在《生命线》中，读者处处可以感受到作者比以往强烈得多的历史现实感。斯塔夫里阿诺斯不再像《全球通史》那样把叙述的重点放在世界各文明的兴衰替换上，而是摒弃了汤因比的模式，理出了四条自古至今始终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命线”（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战争），用这些他所称的“阿莉阿德尼之线”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血族社会，约公元前 3500 年以前的所有人类社会；纳贡社会，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直至资本主

义出现之前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紧紧地穿了起来，作者显然是要告诉人们，这些生命线能使我们的过去与我们现在的全球性危机之间发生最大的联系。

(二)

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心去研究历史，是本书最显著的特点。

在《生命线》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所提出的四条“生命线”，无一不是当今社会中反映突出的现实问题。比如“生态”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看法：四五百万年以前以棍棒和石块作为觅食工具、似乎面临绝望境地的人类，今天的工具是计算机和宇宙飞船。人类是今日地球上无可争辩的主人，并且正在开始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宇宙空间。财富的主要来源不再是自然资源，而是自文明开始以来就被增值起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我们人类在这颗行星上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但也为自己的成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技术是我们的独特创造，但我们目前正面临着驯服技术这一极为艰难的任务。与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这些人为的大灾难相比，早期狩猎者们点燃树丛以驱赶猎物而给环境留下的轻微破坏痕迹根本不足挂齿。我们发展了技术力量来建立一个新世界，但我们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能量来创造一个值得人们在其中生存的世界。技术上的惊人发展往往用来使少数人获益而使大多数人遭殃。目前首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构建这样的社会，使得今日对充足的食物贮藏之利用可以同血族社会对自然界充足的食物贮藏之利用一样自由。“阿拉伯神

话里的妖怪既已出来就没法再把他塞进瓶子里去了，因此，渴望那种简单的旧石器时代的生存方式必然是一种浪漫式的对现实的逃避。相反，我们的任务是推进社会形式，使之能够促成技术的使用，给大多数人都带来好处，这种形式善于滋养我们生存的星球而不是摧毁它。”

作者所提出的技术的发展与容纳技术发展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矛盾。带着这样的问题去了解 and 认识人类以往的社会，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就能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清晰、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够接受。关于历史认识的目的，尽管历史学家有过长期争论，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承认，只有从现实的目的出发，只有为现实的需要服务，历史研究才有意义，才有出路。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不论承认与否，实际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中走与现实相联系的道路。就连 19 世纪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主张研究历史不应追求任何实用目的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或者是宣称“欲为纯客观的史”的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在从事历史研究时都无不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从来也无法“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客体虽然是以往的人类社会，但它的主体——研究者——却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研究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制约。这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决定了历史学家总是带着当代社会生活的烙印去研究历史，寻求答案，以获得历史的启示，说明或解决当代的问题。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引导人们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它。这一观点在柯林武德那里进一步发展，成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些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过分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作用，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使我们能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或“写”历史的角度得到一些有益的解释。既然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当代的人，那么由于他们所处环境、社会地位、生活方式、阶级立场、思想倾向、认识能力以及个性、兴趣的不同，便会带着不同的现实目的，从而也从不同的现实起点出发去研究历史，由此也就产生不同的历史解释。这就是历史“常写常新”的缘故。

由此可见，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尺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历史认识水平的高低和效果的优劣。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学家必须善于从现实中发现和提取对人类社会发展有说明意义的主题，从而使历史与现实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有机地贯通起来。黑格尔为19世纪上半叶西欧社会的急速进步所陶醉，于是得出了世界精神在日耳曼-基督教世界达于顶点的结论。如此把握现实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必然导致西欧中心论。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是历史学中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它在对哲学作出反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完全倒向“科学”的怀抱。而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却能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从而最全面、最深刻地洞察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并由此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

进入本世纪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观点和方法上不同程度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靠拢。这一点在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如马克·布洛克、吕西安·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人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布罗代尔说过：“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勒高夫也认为：“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自从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历史学家不难发现，只要是带着现实问题去研究历史，只要是想去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和发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及其规律，那就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进化理论最为有效，使用起来最为得心应手，也最易获得更圆满的答案。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在《生命线》中，读者也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在对现实问题的思索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所受到的诸多启示。首先，他对当代问题的理解，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运动的框架下进行的。其次，他在强调当代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他的三阶段演进理论，也是建立在落后的社会形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的观点之基础上的。作者不仅论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充分展示了人们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和交换的社会环境。他的后三条“生命线”（两性关系、社会关系、战

争)，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再次，作者对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力”的看法，表明了他对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人类更理想、更完美的社会形式的追求。虽然作者不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论者，但他关于人类应在历史规律的作用下作出最佳选择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相左。

(三)

本书是分析式的，不是叙事式的。

分析式通史与传统叙事式通史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不必遵循时间的先后顺序去记述史实，不是以讲“故事”的形式把历史写成描绘人物活动与事件过程的叙事体、事件体。实际上，要在一部仅 20 万言的书中，向读者展示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这本身就决定了它只能分析，而不能叙述。而且，即使是分析，也只能是“粗线条”的，正如作者所言，如国家、民族主义和高雅文化等等在一般通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问题，要“敢于省略”，“不惜冒过分简单化的危险”。因此，本书是一部很有选择地对能说明我们现状的、过去的那些方面进行分析的历史著作。作者所选择的这四条“生命线”，在概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时究竟能否收到疏可走马之效，究竟是否如作者所言“包括了最广泛的、对我们今天有直接关系的人类经验”，自可由读者去评说，但本书所体现的简要而宏大的整体构思，却是分析式历史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典范。

分析史学发端于本世纪上半叶对兰克式实证性和经验性

史学模式的批判，而在本世纪中叶以“新史学”的确立而成为主流。这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影响，又是本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结果。分析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结构分析、突出理论概括，反对对历史事件的单纯叙述和描绘，而是要提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简言之，传统史学是要说明“原来如此”的问题，分析史学则要回答“为何如此”的问题。于是，以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新史学”，就在理论概括和解释方面，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在历史材料的使用方面，在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方面，无不比传统史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战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但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分析，并不等于完全摒弃政治史和叙事史，更不等于用抽象的结构分析和图表公式湮没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分析史学在某些方面的极端发展恰恰成为近十几年来西方史学中“叙事史”复兴的重要原因，西方史学似乎重又陷入“危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方法论之争，而实际上却牵涉到了历史学能否作为一门科学而独立存在的大问题。

其实，历史著作中的分析与叙述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从叙事的角度看，历史学与文学较为接近；从分析的角度看，历史学与哲学更为相似。只有做到这二者的真正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学的独立性问题。没有历史的叙述，也就没有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从而也就没有了历史；而没有理论对这些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分析，历史研究便只能处于“讲故事”的低层次上。简单地以此代彼，或非此即彼，不但不能解决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问题，反而会加深这

种危机。目前西方史学界那种似乎介于哲学与文学之间左右摇摆的两难抉择，实际上要解决的就是论与史、分析与叙述、宏观与微观、科学性与美学性的关系问题。人们已注意到，当前主要出现于“新史学”营垒内部的“叙事史复兴”现象，其实就是对“新史学”本身的偏差进行纠正并作出补充的结果，“新叙事史”既没有全面否定“新史学”，也不是向传统史学模式的复归，从整体上说这是“新史学”在前进道路上必经的一个纠偏和完善过程，这种危机本身便包含了积极因素。

对此人们已有一些介绍和评论，我们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结合《生命线》一书而有以下两点考虑。首先，《生命线》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新史学在近年所经历的新的定向过程。本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与那种风行一时的计量式、统计式的分析方法完全不同，书中全无表格、公式、符号之类，统计数字的使用也是慎重选择的。本书也不是纯粹分析的，不是以单纯的概念和理论的抽象表达去腻烦读者，而是通过夹叙夹议的形式，以精心选取的生动事例来表明观点，尽管这些事例不都是些完整的描述。在这样一部反映人类社会漫长历史而又篇幅有限的书中，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去描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件，本书要起的是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的作用；作者为我们勾画的只是整个森林的轮廓，而不是每棵具体树木的形态。如果读者在其他书中所看到的每棵“树”，合在一起便能形成眼前的这片“森林”，这就是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了。读过本书的读者或许会有这样的感觉：假如将本书的篇幅增加数倍，一定可以有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引人入胜的事件展现在眼前。在分析史学面

临新的抉择的形势下，作者的这一努力尤其显得可贵。

其次，本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许会对我国的史学研究起到激浊扬清的推动作用。无可否认，我国传统史学有着许多应该继承和发扬的长处，但总体上说来，其研究偏重于史料的考证和史实的叙述。黑格尔说过：“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见解。”话虽说得过分，不过与西方史学相对而言，我国传统史学重的是“学”，而不是“识”，人们不善于进行综合的抽象思维，不习惯寻求高层次的理论指导，致使历史研究长期停留在史料水平上，传统史学始终未能获得一个科学的基础。本世纪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使我国历史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是以阐述人类社会基本规律来指导人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一般性历史哲学，重要的是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融合在研究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中，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套用作公式，然后从历史中寻找事例加以填充，对经典理论进行公式化、程序化的演绎和诠释。我们在这方面走过弯路。近十几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此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在历史研究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广大读者希望有更多的“学”与“识”结合得好的历史著作问世。在此，我们读一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生命线》，看一看西方的这位有“识”之士在从事历史研究时的某些长处，可能不啻在方法论上会对我们有所启迪。

(四)

关于本书的观点，本文不打算作全面分析，只想就几个突出方面作些介绍。

首先是欧亚大陆文明中心论。这一在《全球通史》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观点，在《生命线》中被作者继续坚持。在作者看来，自人类的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起源以来，欧亚大陆的文明始终在全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近代，欧亚大陆对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影响，而相比之下，非欧亚大陆文明给近代世界留下的遗产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作者的解释，欧亚大陆所以取得优势就在于：一、这块大陆是地球这一行星的中心区域，地括世界 4/5 的陆地，拥有占人类 9/10 的人口，在资源方面也占有优势；二、它享有相互易接近的决定的有利条件。欧亚大陆所有的文明，不论是东方的中国文明、南方的印度文明、西南方的阿拉伯文明，还是西方的欧洲文明，很长时期中一直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们交换各自驯化的动植物；交换各自作出的发明，如欧洲人对中国“三大发明”的利用；甚至还“交换”微寄生物的侵扰，以致逐渐发展起了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的免疫力。这样，欧亚大陆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居主导地位便成了必然趋势。在这里，作者强调了不同大陆的文明对人类的不同贡献，尤其强调了各文明相互影响以及人类交往的重要，并不是把目光一味盯在历史上的各个先进文明上。这种观点与希腊—罗马文明中心说的最大不同，不仅仅在于它把人类文明的中心从西欧一隅扩大到了世界大部分地